

共和国成长教育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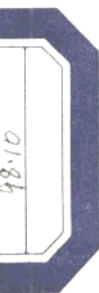
天网恢恢

打击违法犯罪

● 主编 邓先明 胡海 ● 闫宏利 著



中国物资出版社



《共和国成长教育丛书》⑧

天网恢恢

——打击违法犯罪

闫宏利●著

中国物资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网恢恢——打击违法犯罪/闫宏利著. 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10

(共和国成长教育丛书;8)

ISBN 7-5047-1555-7

I. 天… II. 闫… III. 治安管理—概论—中国 IV
.D63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9066 号

中国物资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98 字数:1800 千字 印数:1~10000

ISBN 7-5047-1555-7/G·0333

(全套 27 册)总定价:128.00 元

目 录

一、激浊扬清 50 年	(1)
二、剿匪镇反定风云	(4)
三、雷霆初动奏凯歌	(11)
四、共和国的反毒战争	(22)
五、万恶之首归去来	(30)
六、拨开心灵的迷雾	(35)
七、赌海沉浮的警示	(41)
八、万家灯火平安夜	(50)
九、守护精神的净土	(58)
十、中华文物忧思录	(64)
十一、擎起大国惩腐之剑	(73)
十二、力克江湖空手道	(84)
十三、一路平安的承诺	(92)
十四、追缴黑枪大纪实	(98)
十五、截断栈道陈仓	(106)
十六、辉煌明天，何铸风流	(113)

一、激浊扬清 50 年

犯罪，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就一直围绕人们的社会现象。

经过硝烟和战火的中华民族，更加渴望和平，爱好安祥宁静。从建国到如今，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政府和公安人员，为了人民的幸福和祖国的安全，与犯罪分子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

在世纪末回首，我们可以发现，从共和国成立以来共发生过五次犯罪高峰。前三次是在改革开放前 30 年。而且，每次犯罪高峰都有其独特的社会背景和特点。

新旧社会交替，第一次犯罪高峰是建国初，峰顶是当年立案 58.3 万起的 1950 年。此时正值消灭旧制度巩固新政权的剧烈动荡时期。旧社会的残留分子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充满刻骨的仇恨，千方百计进行颠覆和破坏。首先是反革命破坏案件多。其次是旧社会遗留的犯罪较多，如制毒贩毒、赌博、卖淫嫖娼、拐卖人口等。中央积极采取镇反、肃反、肃毒、三反等有力措施，横扫余孽，荡涤浊水，短短几年基本禁绝了横行中国百余年的烟毒灾害，埋葬了旧中国长期的娼妓制度。人们由衷地感到：新中国的天是晴朗的天。

天灾人祸下，第二次犯罪高峰发生在三年困难时期。峰顶为1962年。由于国策的严重失误，反右派、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苏联政府的背信弃义，一系列的内外交困，触发了以侵财犯罪为主的第二次高峰。中央及时采取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治安秩序很快好转。从1964—1966年，堪称我国社会治安的黄金时期，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曾要求社会治安管理像“玻璃板”、“水晶石”一样透明。儿歌中所唱的“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马上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无疑是对当时社会风气和政绩的写照。

文革内乱中，出现了第三次犯罪高峰，当以1973年为峰顶。这是一次独特而又复杂的犯罪高峰。大量的犯罪行为是打着“造反”旗号，以打、砸、抢的形式出现，有强烈的政治运动色彩，随着“四人帮”粉碎，公安工作步入正轨后才结束。

改革开放初期，第四次犯罪高峰发生在七八十年代交错之际。此时社会由封闭型转向开放、由静态慢节奏转向动态快节奏。引起了社会道德、价值观念、利益结构的倾斜失衡。再加上社会控制力的减弱，从而使犯罪活动进入高发期。峰顶为1981年。经过1983年的严打，到1984年回落到低谷，治安状况一度好转。

过了仅一二年，案件又大幅度回升，出现了强力反弹，1985年立案是1979年的四倍，进入90年代，犯罪像洪峰一样上涨，90年代中期发案率上升到80年代的前半期的八倍，出现第五次犯罪高峰。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对外交流的加大，我国犯罪种类日渐走向国际化，国际上有的，我国皆

有之，如私造、贩卖枪支弹药、电脑犯罪、绑架人质、伪造货币和信用卡等，摆在中国治安面前的困难越来越多。

从这简单的概述中，我们清楚地感到，犯罪分子越来越残酷，手段越来越复杂、智能化。同时，我们也欣慰地看到，每经过一次犯罪高峰的洗礼，中国警察就能从斗争中吸取更多的经验，变得更加坚强和成熟。

敬爱的周总理曾说：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如果说犯罪分子像阿拉伯“天方夜谭”中跑出魔瓶兴风作浪的妖怪，那么公安人员则是黑白世界之间的一堵墙。以正义和责任与这只妖怪较量、厮杀、搏斗、护卫身后光明世界中的善良的人们。

面向新世纪，激浊扬清 50 年的中国警察：

俯沧海之横流兮，仰浩然之正气；

察众生之多艰兮，炯双眸之如炬；

耸铁肩之擎举兮，激浊浪以扬清；

咏君子之无逸兮，配剑胆以琴心；

鼓笙箫之雅韵兮，歌青春之多壮丽！

二、剿匪镇反定风云

土匪，在中国数百年的历史上，它的显赫和猖狂，源远流长。绵延不断的战争、灾害、兵祸，使它在这片古老、封闭、贫穷、落后的土地上萌生，得以滋养，犹如幽灵一般，成为数百年来不绝于中华大地的一种奇特现象，一种伴生的灾难，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是极其罕见的。

凡为匪者，不管它起什么雅号，诸如“仁义军”、“大善人”之类，只要它生存发展起来，窥其走过的道路，步步是人民斑斑血泪，它靠的就是“砸窑”（抢财物）、“绑票”（抓人质）、“插入”（杀人）、“放亮子”（放火）、“别梁子”（劫道）、从中“挑片”（分钱），达到享乐目的。

美丽富饶的东北地区，曾是匪祸猖狂的地方，仅临江一县，在民国期间 13 年内就发生数千个胡匪案例，百姓畏匪如惧虎，昼不敢远行，夜不能成眠，有钱有物担忧，有儿有女发愁。解放战争期间，各地土匪蜂起，与国民党勾结进行反共内战，小说《林海雪原》反映的侦察英雄杨子荣以其独特的方式智斗匪首“座山雕”的故事，就是 1946 年发生在牡丹江地区的真人真事。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反动派

为颠覆和破坏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伙同各地的“草头王”，发动大规模武装暴乱，用极其残酷的手段，杀害我干部、战士和无辜群众，妄图摧毁各级人民政权，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蒋介石于濒临毁灭的最后半年中在重庆筹办了“游击骨干训练班”。从1949年下半年到12月底成都解放，前后共办了五期，培训学员3000多人。并制定了《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对“游击武装”布置了具体任务，要求他们“各自为战，苦撑待变”并“利用当前社会问题制造事件”，积极主动地进行“灵活的斗争”，破坏一切军用设施，消灭一切有生力量，最终配合国民党完成“反共复国”的“大业”。这一垂死的挣扎，虽像覆巢前的哀鸣，却也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力。应该说，长达3年之久的匪患，其源盖出于此，它在全国各地埋下了定时炸弹，增加了建国初期的不安因素。

1950年春，呈现在中华大地上的那场十分严重的灾荒，给这片土地上历经数百年未泯灭的匪患再起，给失败了的国民党反动派对新生人民政权的破坏，造成了一个时机。据解放初期统计，遍布城乡的政治土匪有200余万，特务间谍分子60余万，反动党团骨干60余万。特别是美帝国侵朝之后，他们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东山再起的时机已到。狂妄地向人民反扑。

他们别有用心地煽动胁迫落后群众，策划反革命暴乱，袭击地方政府，甚至颠覆夺取基层政权；利用暗杀、绑架、投毒等卑鄙手段，血腥残杀基层党政军干部和群众；公开抢劫财物，焚烧民房，奸污妇女，制造恐慌；破坏交通、工厂、矿山，干扰经济事业和破坏生产，同时还散布谣言，蛊惑人心，

离间党群关系，诋毁党的政策。

毛泽东刚从苏联访问归来，就收到了西南土匪暴乱的急电，朱德又汇报了全国各地土匪暴乱的情况：这次匪祸，人数之多，活动，猖狂，破坏之严重，是我国历史上从未见过的。毛泽东坚定地指出，“对于一切大大小小的土匪武装及其暴乱行为，必须立即予以坚决的剿灭和镇压！”

1950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出了《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自此，一场空前的，长达三年多的剿匪斗争，迅速在全国展开了。

同年的9月，当整个北京都在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周年纪念盛典忙碌准备的时候，一个号称“北平市人民反共救国决死队”潜伏在北京的土匪武装组织也正在策划和准备着。他们妄图在盛典中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一举杀害，并控制中央最高领导机关。在天安门广场的南面，与城楼遥相对应的前门附近一幢居民楼的三层楼上，安置了“六〇”迫击炮两门，还有电台一部。在获得这一重要线索之后，人民政府经过紧张的侦破和调查，于9月26日，逮捕了身为北京市某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决死队”队长李安东和潜伏在北京市内该土匪组织的全部骨干。

西南地区是解放最晚的地区，土匪气焰十分嚣张，以刘、邓、贺为首的西南局、西南军区，决心把此次的剿匪看作新形势下的一场“淮海战役”，组织了广泛的剿匪统一战线，摸索出一条“一元化”的剿匪新路子，从根本上扭转了部队单枪匹马作战的局面，取得了广大贫苦人民的支持

经过全面清剿和重点清剿两个阶段的剿匪作战，新解放区的股匪已基本上被歼灭，匪乱已基本平息。但仍有极少数

的股匪逃到边远山区躲藏，并伺击出动，破坏社会安定。1951年2月，党中央决定，坚决消灭一切残存土匪，除恶务尽，不留后患。各新解放区相继展开了大规模清剿残匪的战斗。积极发动群众，使残匪无论窜到哪里，都逃脱不了人民群众的天罗地网，到1953年上半年，终于结束了我国长期以来的匪患。

经过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洗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剿匪中显示了它不可战胜的力量。仅仅3年的时间，就剿灭了我国数百年延续不断的匪乱，歼灭土匪240余万。这一切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成为可能，只有人民的军队才能将其全歼。

在剿匪进行的同时，中共中央还领导全国人民对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及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进行了镇压。

这些旧社会的残渣余孽为失去昔日为所欲为的“天堂”而百般仇恨，或潜形匿迹，或明火执仗，疯狂地进行种种阴谋破坏活动。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反革命残余分子纷纷撕破平日伪装悔改的假面具，在社会上大肆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和破坏活动。他们与土匪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啸聚散兵游勇地痞流氓不断发动暴乱。残杀干部群众，抢劫财物，奸污妇女，破坏生产，无恶不作。北京反动会道门九宫道坛主全汉魁，专门从事编造、散布谣言活动。1950年国庆前，散布什么“蒋介石的飞机要来轰炸”等谣言。

反动会道门是中国封建社会产生的一种迷信组织，多为统治阶级收买和把持，成为麻醉奴役人民、维护反动统治的工具。解放后，又被反革命分子所利用，成为制造反革命谣

言的大本营。道种名目繁多，有什么一贯道，九宫道，大佛教，一心堂，天爷香，梅花拳，混元门等多种名堂。其中一贯道是遍布全国组织最严，道徒最多，作恶多端的反动会道门。其会众经常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编造各种妖言妖语，恶毒污蔑和诽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胡说什么“现在是佛魔世界，王魔闹中华，流星要下地狱（指五星红旗）”；“红花落，白花鲜，龙年龙月见青天”（龙年指1952年）。当有的地区遭受风、水、虫等自然灾害时，又乘机造谣惑众。搞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

有的反革命分子受美蒋特务机关的授意与派遣，或伪装积极、投机钻营打入我党政军机关及经济部门；或建立与发展反革命组织；或建立反革命武装，充当美蒋的别动队与坐探。如潜伏在武汉市的国民党少将特务胡子民，网罗特务68人，建立地下武装，妄图建立“敌后政权”；受蒋匪派遣的武装特务104人于1950年5月从青岛登陆，成立所谓“山东地区人民反共救国军”，计划进行爆破、暗杀、抢劫粮库、刺探情报、印制伪钞等破坏活动。据湖北省公安厅1951年2月10日向中央的报告，仅省党政军机关就清查各种暗藏反革命分子160名，担任处长的5名。西南军政委员会直属的财政、经济、交通机关就清查各种反革命分子350余人，登记的国民党员及会道门分子达5700余人。

为了失去的“天堂”，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凶狠残暴，不计手段，灭绝人性。严重威胁着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如不对其迎头痛击，则将国无宁时，民无宁日，整个神州将成为其肆意横行的“天堂”。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公开申明：对美

蒋反动派及其走狗必须实行专政或曰“独裁”，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否则就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并号召人民：“学习景阳冈上打虎的武松。”同时还指出：“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1950年3月，在大举剿匪的同时，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依照指示，各级人民政府对各类反革命分子进行了镇压和清查。

人民法院于该年的6月14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规定其主要任务是：运用司法秩序，惩治反革命分子，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法庭的普遍建立，弥补了司法机关力量的不足，为镇反斗争增添了新的武器。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对一切反革命活动采取严厉的及时镇压，继续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以期团结人民，孤立反革命分子。并对其中罪大恶极者，规定了严厉的刑事处罚。

建国后的一年多来，镇反工作的成绩有目共睹，但右倾偏向的缺憾也存在。司法部长史良在肯定成绩时，指出了“镇压不足，宽大有余”的缺点。这导致了群众的不满，政府威信受损，反革命分子窃喜之余继续为非作歹。为此10月10日，中共中央特地发出了《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右倾偏向的指示》，各地掀起了检查批判“宽大无边”错误的热潮，当杀者，杀；当监禁者，监禁。到12月底，右倾偏向基本被扭转，一场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蓬勃兴起。

在运动中，毛泽东亲自坐阵指挥，提出“要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否则就会“为反革命利用，为民主人士所不满，为人民所不同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拥护和支持。

1951年2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正式出台,为镇反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

在镇反运动中,各地积极发动群众,广泛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镇反政策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大张旗鼓的运动,使敌焰大降,民气大伸,人民群众积极协助政府控告、揭发、缉拿、追捕隐藏、逃窜的反革命罪犯。如勾结帝国主义捕杀李大钊等20余人的军统特务吉安;残杀刘胡兰的凶手张全宝、侯西田;制造京汉铁路“二七”惨案、杀害工人领袖林祥谦的主要凶手之一赵继贤等等,纷纷落入法网,受到人民的惩罚。

到9月底,全国性的镇反运动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公安部长罗瑞卿对此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总结。他说:“镇反运动的无比沉重的力量,予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势力以摧毁性的打击。”1952年10月,全国80%的反革命分子已受到杀、关、管各种惩处。为夺取镇反斗争的彻底胜利,公安部召开了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提出将一切不彻底的地方和不彻底的方面所隐藏的反革命分子,继续搜捕,严厉惩处,扫清残敌,圆满完成任务。年底,全国镇反运动胜利结束,共歼灭土匪240余万,关押各种反革命分子127万,管制23万,杀掉71万。

镇反运动的胜利,使反革命分子的美梦幻灭,消除国家不安定的隐患,割弃了政治动乱的祸根,荡涤了毒化社会的污秽,新中国的天是晴朗的天!

三、雷霆初动奏凯歌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扫千军如卷席。三大战役之后，军事上土崩瓦解的国民党政府在经济上陷入极大混乱。持续的恶性通货膨胀，发展到了极点。

1948年12月1日，为了迎接全国解放，中国人民银行宣告成立，开始发行人民币。随着解放区的扩大，人民政府用人民币收兑了金圆券。北平市解放的第七天，就开始了金圆券的兑换工作。有99.2万人得到了1.1524亿元（旧币）的优待好处。平均每人多得116元。按当时粮价，可买小米11.6斤。这次兑换，人民非但没有遭受损失，而且获得好处。这在以往任何社会的货币改革中都是没有的。人民拥护，则是自然而然的事。

建国以后，面对共产党人终于取胜这一现实，一些人心理上不能接受。人民币进入市场时，收兑金圆券的工作毫无障碍，却遭到了银元、黄金和外币的对抗。当时流通领域中，投机资本成风，在市场上兴风作浪，利用人民对纸币存在的不信任心理，一有风吹草动，就纷纷争购银元。人民币开始大量进入市场时，投机资本哄抬银元价格。在上海，从解放到6月9日，银元价格上涨达五倍，买卖遍布大街小巷，刺

激了物价上涨并阻碍人民币占领市场。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坚决取缔银元投机，确立人民币的通货地位，才能稳定物价。北平市军管会解放后经过两个月的查禁和打击，到4月底，银元的流通和买卖基本上没有了。

上海解放10多天后，人民政府宣布禁止以金银计价、流通使用和私自买卖。上海的投机商人对此置若罔闻。大肆进行银元投机行动，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本来已命令停业，实际上并没有停，成了半公开的银元投机指挥所。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下令：用政治手段，打击银元投机！6月10日，正当证券大楼内的交易行情扶摇直上时，两个营的战士配合400名事先派到交易厅的便衣，查封了证券交易所。逮捕了200多名投机奸商。与此同时，广泛发动群众上街，取缔街头巷尾的银元贩子，黑市交易。平息了金融投机风潮。

在广州，取缔了从事投机生意的87家地下钱庄及扰乱金融市场的街头兑换店。

“银元之战”落下帷幕，人民政府取得了“白色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

然而，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并未受到重大打击，未伤元气，很不服气。由于当时物价不稳，粮食和纱布往往代替货币充当筹码。资产阶级就把眼光转到粮食和纱布市场。他们大肆囤积，利用当时的灾情瘟疫，哄抬物价，扰乱市场。

以津沪为先导，华中、西北蜂涌而起，全国物价猛涨。

京、津以粮食带头。上海是纱布带头，资本家估计政府手里的纱布不多，就从这里突破大有孤注一掷之势。武汉受上海影响，也是纱布带头，涉及粮食。

刚刚安定下来的民心，又浮了起来。

迫在眉睫之际，中共中央与各级政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各地物资市场进行了清理整顿。

北京逮捕了以“粮老虎”王振纲为首的一伙粮食投机商。将其经营的面粉厂和粮店一切财产予以没收。稳定了北京市场。

为了给投机商以毁灭性打击，人民政府开始在全国调配物资。11月15日至30日，每日由东北运粮1000万斤左右入关，供应京津地区。与此同时，将华中的棉花东运，把陇海沿线的积压纱布运到西安。各大城市都集中了充足的物资。各地统一行动，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双管齐下，一面筹措物资择机抛出，一面收紧银根。

起初，贪心不足的投机商人为了囤积居奇，甚至不惜高利贷借债大量买进。却不料，早有准备的人民政府连抛10天。他们再也坚持不住，不得不把手中的粮食、纱布等物资低价售出，不仅没有获得暴利，还得付出令人咂舌的高利贷利息。为了还息，再借新债，恶性循环，最后许多投机资本家终于宣告破产。那些借钱给投机商的私人钱庄，也因贷款收不回来，宣告倒闭。

1950年3月，政务院发出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对全国财政收支、物资调度、现金使用进行统一管理。同年4月财政状况开始好转，收支接近平衡，市场进一步稳定。

至此，“白色战役”完全结束，建国初期打击投机、平抑物价的斗争告捷。

毛泽东对陈云的理财能力大加赞赏，借用刘备夸奖何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